

生活与旋律

黄冰

中国文联出版社

生活与旋律

黄 准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8 北京

内 容 说 明

电影中优美动听的歌曲、雄壮激越的旋律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著名电影作曲家黄准同志的这本书，会使您得到满意的回答。从1948年为人民电影摄制的第一部故事片作曲以来，将近40年了，黄准一直在电影音乐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她创作的旋律已成为电影的有机构成的一部分；而她创作的许多歌曲，通过银幕，又广泛地、长久地在人民群众中流行。

责任编辑：王中成

封面设计：吕 蒙

万 庆

生活与旋律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5/8 插页：8 字数：163000

1987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8061·3101 定价：2.10元



作 者 照

目 次

不懂旋律的漫谈

——《生活与旋律》读后感……………荒 煤(1)

旋律——我人生的路……………(6)

对时代音响与地方色彩的探求

——影片《红色娘子军》音乐创作体会……………(45)

对电影音乐民族化的探索……………(50)

谈电影中的音乐形象……………(62)

要象一个背枪的战士……………(67)

关于提高电影音乐质量的几点建议……………(70)

再谈电影中的音乐形象……………(78)

为电影塑造鲜明的音乐形象……………(93)

浅谈《舞台姐妹》的音乐创作……………(110)

《舞台姐妹》新唱……………(122)

《北斗》音乐创作的自我解剖……………(128)

一部电影音乐的诞生

——谈《牧马人》音乐创作……………(142)

这支歌对我也是难忘的

——谈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的歌曲与音乐创作	(161)
旋律在生活的土壤上飞舞	
——作曲散记	(168)
向生活学习	(171)
从矿井里获得的音乐	
——《燎原》乐曲创作手记	(175)
歌曲献给“蚕花姑娘”	(178)
乐坛情长	
——亚洲作曲家大会及音乐节散记	(180)
可贵的精神	
——读贺绿汀新曲有感	(188)
电影作曲家萧珩及其作品	(192)
《洪湖赤卫队》音乐壮丽	(205)
谈《闪闪的红星》的音乐创作	(207)
《庐山恋》电影音乐欣赏	(217)
回忆延安	(226)
——听庆祝八一建军节音乐会有感	
我永远记住	(228)
歌唱伟大的时代	(233)
愿艺术生命永远年轻(代后记)	(236)

附录

军爱民，民爱军——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主题歌……林 一 词(248)

劳动最光荣——动画片《小猫钓鱼》主题歌……

……金 近 夏 白 词(249)

青春闪光——故事片《女篮五号》插曲……卢 芒 词(251)

采香菇——故事片《苗家儿女》插曲……周 易 震 词(254)

娘子军连歌——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主题歌……梁 军 词(257)

蚕花姑娘心向党——故事片《蚕花姑娘》插曲……阿 锡 东 词(261)

年年难唱年年唱——故事片《舞台姐妹》插曲……徐 进 词(263)

轻歌悄唱——故事片《北斗》插曲……胡 苏 词(264)

敕勒歌——故事片《牧马人》插曲……范 明 词(267)

一支难忘的歌——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主题歌……叶 辛 词(269)

不懂旋律的漫谈

——《生活与旋律》读后感

荒 煤

我不懂音乐创作，因此，当黄淮同志把她的创作回顾与总结性的文集《生活与旋律》送来，要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言的时候，我确实感到有些惶恐。

我曾明确表示，我是一个“音盲”，不能接受这个任务。但是当给她来信，说只是希望我看看她的一些主要的论文，看她创作的道路是否走对了，而并不要对她的作品作什么具体的评价；特别是看到来信最后的署名——这位年近六旬、从事电影音乐创作近四十个年头的作曲家，仍然写着“小黄”两个字，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延安鲁艺的时代，我禁不住特别先看看她写的《回忆延安》、《我永远记住》这两篇文章。回忆往事，不禁使我浮想联翩。小黄这个十三四岁的姑娘的影子，顿时在我眼前活跃起来：圆圆红润的脸，黑亮黑亮的大眼睛闪耀着天真的、兴奋的光芒，在唱《黄河大合唱》，在跳秧歌舞……。

回忆延安时代，我们这些在延安度过青年时代的老人，总不免有些特殊的感情激动。不论是过去早已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或是刚迈进艺术大门的孩子，也不论是早已参加革命文艺活动的战士，还是刚刚接受艺术教育的少年，可以

说，都是在那里接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我们这一代，由此焕发了艺术生命的青春，因而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而比我们年轻的一代，在艺术生命还未开始的时候，就迸发了一株茁壮的萌芽。因为，我们明瞭了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艺术生命的源泉来自于生活。而我们的艺术家，不论才能、年龄大小，在创作中倾注了真挚的感情和心血，都是为了获得人民的热爱。

尽管我是个“音盲”，不懂音乐的神秘旋律，然而我也永远忘不了延安时代是一个歌声遍野的时代，是心灵里充满了激情旋律的时代。至今我也不能忘记《延安颂》、《开荒歌》、《黄河大合唱》中许许多多使我心弦突然感到震动、颤栗的某些旋律，它们所给予我心灵上冲击的力量，是无法形容的。

当我坐在黄土地上（或小木凳上）逼近合唱队，全神贯注地听取这些歌声的时候，我看到小黄、李群、莎莱等站在第一排的这些小姑娘们歌唱的时候，她们孩子气的、泛着红晕的稚嫩的小脸上，在闪亮的眼睛里，在动人的歌声中，显得特别纯真、庄严、亲切、可爱。如果说，我当时年轻的灵魂中有过象征性的“音乐之神”的影子，那么，就是这一群音乐的小天使们。

近半个世纪了，那种享受到音乐之美而产生的心旷神怡的心情，至今难忘。我也曾期望，我们今天这个振兴中华的时代，再来一个歌声遍野的“延安时代”！我不懂，也无法回答，一个新的、洋溢着革命激情音乐的新的延安时代，为什么还不能“再来一个”！

但是，我终究感到庆幸，这几个小姑娘们都成了作曲家。去年在武汉，很高兴地看到了屈原的《九歌》搬上了舞

台，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瑰丽多采的歌舞；整个音乐是优美、雄伟、和谐动听的。作曲家就是莎莱。我不禁拉着她仍然矮小瘦弱的身子，向全体演员和乐队祝贺我这位延安时代的小朋友，我宣称没有想到她这么瘦弱的身子，能够创造出这么一首气势磅礴的乐曲来。

李群也成了一位作曲家。

而小黄居然从事电影音乐创作近四十个年头了，已经为五十多部故事片、美术片、电视片作曲。很遗憾，有些影片我还没有看过。

虽然2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变成一个健忘的、年逾古稀的老人，我已不能完全背诵出来《红色娘子军连歌》全部的歌词，可是，整首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我都还记忆犹新。一旦想起这四句词来，“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那歌曲的旋律，就仍然会在我脑海里激起感情的波澜，而且很自然地出现了琼花的英勇形象，特别是祝希娟同志那副对敌人充满强烈仇恨的眼睛非常明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由乐曲结合画面和演员的形象如此浑然一体，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在我的生活中还是很少见的。

关于这部影片音乐的成功，所获得的宝贵的经验，作者在她那篇《为电影塑造鲜明的音乐形象》文章中，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总结——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她整个创作的基本总结。

纵观黄准同志的全部文章，我感到她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的确比较成熟地把握了电影音乐创造的特征。作为综合艺术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电影音乐既要服从并有利于文学剧本基础所提供的各种典型形象的塑造，又有音乐自己的特色，即主要在于用音乐的语言来表达人物的感情，刻

画人物的性格，又要结合画面用音乐再现典型环境——各种不同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生活场景、地理风光以及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自然，这也极为有利于人物性格特征和思想感情变化的刻画。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黄淮在电影音乐创作的实践中，始终不渝地探索、寻求民族风格的精神。她不是简单地搬用与模仿一些民歌的形式和曲调，而是通过生活的感受并且结合人物的命运、性格、思想感情的发展与变化，汲取当地的民族民间的音乐特色而进行再创造。这样，她就能够发挥音乐特殊的功能，来表现民族的、地方的、时代的特征。她的一些成功的创作，都有民族的风格，而又富于时代气氛。我认为，这对中国电影艺术的民族风格起了很好的作用和做出了很好的贡献。

因为我不懂音乐，又往往被过分的、不必要的、太洋气的音乐所干扰，我曾经开玩笑地讲过，看电影的时候，不感到音乐的存在，就是好的电影音乐。

事实绝非如此。恰恰相反，好的电影音乐融汇了人物的命运、个性、情感、情绪和画面的场景、大自然的风光……真正浑然一体，不是因为我们不感到音乐的存在，而正是音乐使我们思想感情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是一个激动心弦的、完整的、和谐一致的客观存在，我们已经没有可能来分辨人物、画面、音乐之中有什么间隙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掉《红色娘子军》中的连歌。尽管我难以记忆起《舞台姐妹》中某些音乐的具体旋律，但我闭目回忆起某些画面再现的时候，我也似乎总能听到江南风味的、优美而哀伤的乐声。我也难忘《牧马人》中的《敕勒歌》……。

这足以说明，好的电影电视音乐，是视听结合艺术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和优秀的画面是一双不可分离的亲密姊妹。可惜，象“小黄”这种电影音乐家还太少了。尽管她年近六旬，我倒还愿意称她为“小黄”，因为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已经证明有一批“小字辈”的创作人员风涌而起，对电影艺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远远还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电影电视的艺术创作的需要。

最后，我也还要向“小黄”表示感谢，因为读了她的文章，也使我受到不少教育，稍为懂得一些电影音乐家的创作的甘苦，应该向从事电影音乐的同志们表示我真挚的敬意！

至于黄准同志个人所走过来以旋律为特征的人生的道路，我当然认为是对的。这不仅表现在《我永远记住》这篇文章中记述的，她扮成陕北小姑娘坐在花船中跳秧歌舞的时候，听到毛泽东同志热情地呼唤：“你们的方向是对的！”

而她每接受一部新影片的创作任务时，总牢牢记住艺术的源泉来自生活的教导，总坚持要到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生活里去观察、体验，我觉得这就是她的创作能够获得很大成果的最根本的原因。她的创作充分证明她长期追求和探索的旋律——富有民族风格的、鲜明地方色彩的、充满时代激情——人生的道路，的确是走对了。

我祝愿她继续坚持走下去，获得更大的成功。

1985年11月

旋律——我人生的路

当和友人——包括我的同行、合作者以及亲友们，谈起电影出版社约我出这本集子的时候，都为我高兴，同时也都热情地建议我为这本书另写一篇回顾与总结我一生创作道路的文章。有位朋友还给这篇文题了名，即：《旋律——我人生的路》。我接受了这些建议，并采纳了这位朋友的题名。确实，我的一生中没有离开过旋律，她是我生命的主要部分，通过它表达我的思想感情，反映了我几十年来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我的一生算不上十分坎坷，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却像旋律一样的起伏不平，富于色彩。因而我觉得这个题名非常确切。

还有一层意思，即既然是以旋律作为我人生的路，那就是说这篇回忆是从我开始创造旋律时开始。我的音乐创作又是从电影音乐开始，几十年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我甚至想，也可能就在这个岗位上结束我的创作生涯。我热爱这个事业，为它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我的旋律是用我的心来写的，这一点并不夸张，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使人们对我的创作道路有所了解。从1948年开始，在将近四十个年头中，我共创作了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电影音乐四十余部。为了节省篇幅，有些已经重点介绍并收集在本书中的，将不在本文重复。我想在本文中向读者阐述我从事创作以来的全过程。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从来不相信命运，但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却常有许多偶然性。我能踏上电影音乐创作的岗位，就是非常偶然，而且富于戏剧性的事情。尽管我自幼酷爱文艺，大约在不到十岁的时候，就背着父母，偷偷地躲在蚊帐里看《红楼梦》了，但也仅此而已，我的家庭使我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其他的艺术形式。我接触音乐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可以说，我接触了它，就爱上了它，并且离不开它，是在它的引导下我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1937年秋，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军队节节败退，我随母亲、姐姐逃难到苏州乡下。一天，姐姐带着我到池塘采菱时，我听到她在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其实姐姐并不太会唱歌，可是我却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听、最有感情的歌。她唱得自己流了眼泪，我听着听着也流了眼泪。从此我就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我到了贵州省湄潭中学念书，在学校中我成为用文艺进行抗日宣传的小积极分子。同年秋天因参加游行示威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我们唱着革命歌曲激励自己斗争的勇气。后来，在地下党的营救和帮助下，我出狱后到了延安。在延安使我最迷恋的也是那嘹亮、雄壮的歌声《延安颂》、《信天游》等等。于是我考进了延安的最高艺术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因此尽管我非常热爱音乐，但并没有意识到音乐工作将成为我的终生职业。由于对其他文艺形式也同样地爱好，所以首先考进了戏剧系。谁知演了两个戏之后，就发现我并没有表演才能，相反通过参加由冼星海先生亲自指挥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演出活动，倒被音乐系的老师们选中了，于是我在1939年转入音乐系学习。当时我的最大兴趣和最高理想是当一名歌唱家。确实，我在声乐上的学习成绩很

不错。只是因为我那时是学校里最小的一名学生，所以在一些重要演出中当然轮不到我来担任独唱或主要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到了东北并参加了鲁艺文工团。1946年后，文工团到大连演出，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黄河大合唱》中担任了“黄河怨”的独唱演员，并受到舆论的赞扬，后又参加演出了歌剧《血泪仇》。1947年，我被调到兴山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正当我刚刚开始声乐艺术上取得一点成就，并雄心勃勃地梦想有一天我的歌声能回荡在银幕上的时候，由于一次极其偶然的机——我在一次联欢会上演唱了一首由我自己作曲的歌曲。我本想通过这次演唱能在电影厂里展示一下我的声乐才华。没想到，事与愿违，倒被当时的领导袁牧之、陈波儿同志发现了我的“创作才能”，一定要我担任即将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短片《留下他打老蒋》的作曲工作。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过我要当一名作曲家。突然要我放弃最热爱的声乐艺术是多么地痛苦啊！我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尽管当时我还幻想着在这部影片完成后仍允许我回到声乐工作岗位，谁知却从此定了我的终身。

我一向做事认真，既然接受了任务，就想尽力去做好。然而，我的创作能力距要求是那么远。那时，我电影都没有看过几部，电影音乐是怎么回事也弄不太明白，更重要的是，虽然在鲁艺学过一点作曲、和声，但因为条件的限制，连许多乐器都不曾见过。我该怎样着手呢？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我懂得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条真理，我想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生活，一是技巧。而这两者我都没有。

我先深入生活。当时正是东北农村掀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时期，我随摄制组到了东北农村，投身到土改运动中，

看到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对地主恶霸的深仇大恨，也分享了他们得到土地后的欢乐。通过这段生活，我还熟悉了东北的民间音乐，那活泼明快的“二人转”、东北秧歌，以及用“四胡”（即四根弦的二胡）拉奏的抒情曲调，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熟记在我的心中。

深入生活回来，我便如饥似渴地学习作曲技巧。那要经过三四年作曲系本科的课程，我必须在几个月之内掌握它们。我向其他作曲同志们讨教作曲技巧，我向每一个乐队员学习各种乐器的性能及它们的组合。同时还通过听、看外国交响乐总谱，获得器乐作曲的知识。我写好歌曲后，一次次地征求意见，一次次地修改，就这样，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由我作曲并亲自指挥的处女作完成了。出乎我的意外，这部幼稚的作品居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影片中的歌曲，很快在东北地区流传开来。影片中的音乐，大家也反映和画面配合得不错。这使我对创作不仅有了信心，而且也逐渐有了兴趣。从现实出发，作为一个歌唱演员，在电影厂确实无事可做，于是我决心放弃了对声乐的爱好，专门从事电影作曲——从此，正式开始了我的旋律的序奏，一部、一部地创作下去。

1948年后，全国形势大好，我们陆续南下，有的人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我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

全国解放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新中国的成立大典，亲耳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以极其饱满的创作激情，日以继夜地，突击完成了大型记录片《新中国的诞生》，及记录片《太原战后》、《踏上生路》等影片的作曲工作，通过这些创作使我在作曲技法上逐渐地熟练起来。

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第一部大型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导演是颇有权威性的史东山先生。他已经从影多年，是位老导演了。从外表看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二十岁刚出头的女孩子，确实，我的创作经历很短。对于这样一部大型的故事片的作曲工作，我能胜任得了吗？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务。

《新儿女英雄传》是一部反映河北白洋淀地区，游击队在水上、在芦苇丛中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神出鬼没的游击战的影片。全片拍摄规模较大，被列为全厂的重点片，无论在人员和物质配备上要求都很高。我能担任这部影片的作曲当然感到十分荣幸，十分激动。但这些并不能说明我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努力去探索，去创造，一定要边学习，边工作。我随摄制组到了白洋淀，到当地群众中去进行采访，并参加了在芦苇丛中进行战斗的拍摄现场，还充当了一名群众演员。同时，也收集了当地的民间音乐资料。应该说，我已经具备了对生活的知识和对素材的掌握这两个条件，但仅此而已。创作上的重重困难在等待着我。今天再来回忆当年，感到自己十分幼稚。不理解音乐形象有较大的可塑性，也不懂得在电影音乐创作中如何体现音乐本身结构的完整性，更不懂得音乐主题的贯串使用方法。

首先，在对待素材问题上，我狭隘地认为，必须找到和影片内容完全吻合的民族素材方可使用。这样，尽管我收集了许多白洋淀的民歌和民间音乐，却都因为内容不符而被我放弃了。只找到一首歌词内容反映白洋淀战斗的民歌。实际上，这首民歌非常可能是在抗日战争中有人重新填词的。我既没有调查这首民歌的由来，也没有从音调上作更多的研